



节译自

Friedrich Christian Delius
Mein Jahr als Mörder
Rowohlt Berlin Verlag
Berlin 2004
ISBN 3-87134-458-3

页码： 7-15, 20-25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里乌斯
《杀心萌生的那年》

[译者：黄晓晨]

© Litrix.de 2005

来自自由世界的自由之声

那是在一个尼古拉日¹的傍晚，暮色中我获悉了要把自己变成谋杀犯的使命。对此我几乎是立刻就接受了，尽管这样的决定里多少有些让人捉摸不透的草率。那是一个男性的坚定的声音，它从空气中、从辽远的苍穹中传来，唆使我接受这一使命。这个男人不是魔鬼，也不是上帝，而是一个照本宣科地播报新闻的播音员，但我觉得他仿佛是在广播里用另外一个声音与我耳语：杀死 R. 这个谋杀犯。这个声音来自 RIAS——柏林美占区电台，而且还是在神圣的尼古拉日，所以当我今天供出早已过了法律追究时效的谋杀企图时，谁要认为我当时有些神经错乱，我完全可以理解，其实当时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肯定是疯了，这我现在也能理解。

我的这个秘密无人知晓，警察也好我最好的朋友也罢，谁都没有察觉到我隐埋在心里的犯罪冲动，而且我在别人看来是一个安静平和的人，所以我在大家谈到“谋杀”和“暴力”这类话题时的沉默也从未引起过怀疑。现在我可以说话了，是招供的时候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想唤醒那段回忆，并重新拾级而下，走进那间半地下室的小居所，就是在那里，曾有一个大学生打开了收音机，往瓷砖壁炉里添了煤，烧着水准备冲速溶咖啡，此时，他的母亲在基督降临节²寄来的姜汁糕点正散发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香气。

因为没有人会这么快相信我曾动过杀机，所以我必须得从头讲起，壁炉和糕点也就都变成了我所叙述的证据链中的一环。只要我还不能排除是姜汁糕点的刺激让我萌生了杀心，就不能在我的书面供词里将它略去不谈。我必须得自己审讯自己，这种晦气是我没有被抓捕归案的结果。就像在任何一部好一点的侦探剧里所描述的那样，犯罪动机、犯罪前的精心准备以及犯罪行为本身进行时的有条不紊都是得一步步地逐渐展

¹ 尼古拉日：12月6日，按民间习俗，圣尼古拉（圣诞老人）在这一天显圣，并给孩子们送礼物。

² 基督降临节：圣诞节前第四个星期日开始至圣诞节止。

示在观众面前的。

广播里在播报着新闻，用的是一般新闻德语里的普通句子，我并没有认真听，阴郁、潮湿的十二月让我觉得有些累。瓷砖壁炉烧得慢，房间还是阴冷阴冷的，我就从播音员的声音那里取暖，那是我所熟悉的男低音，它会在每个整点作为来自自由世界的自由之声出现。姜汁糕点有些硬，吃起来也不够甜，我在等着听天气预报，然后是莫扎特或者贝多芬的曲子，然后就关上收音机。

和柏林所有其他的电台一样，美国的柏林美占区电台也难避宣传工具之嫌，但是他们有最好的播音员，那些播音员的声音颇具诱惑性和磁性，听起来就像战胜国本身那样阳刚、坚定、让人有安全感。当时我更多的是在欣赏那个男低音的抑扬顿挫，而不是在听新闻本身，直到它用惯常的方式播报了这条新闻：柏林州法院刑事陪审法庭做出判决称，对前人民法院法官汉斯-约阿希姆·雷泽在七个案件中犯有谋杀罪的指控不成立。

这条新闻没什么可引起轰动或出人意料的地方，即使在当时那个年代也没有。事实上，如果判决不是这样的才会让人感到惊讶。法官不会判法官有罪，即使那是将两百多人宣判了死罪的纳粹法官，总之就是不会判他们有罪，这是老一套了，这次又被证实是对的。但是在这条新闻后还潜伏着另一条如耳语般播报着的新闻，我好像是用第三只耳朵，通过它充斥着矛盾的内耳的曲回，从来自天空的声音中听到了这一神秘的消息，这一清楚的要求：有一个人将要发出一个信号并把这个谋杀犯杀死，而那个人将会是你。

不，我没有喝酒，没有吸毒，也没有沉醉在床第之欢中。“有一个人将要发出一个信号并把这个谋杀犯杀死，而那个人将会是你！”当这个句子击中我时，我清醒的很，只是有点累。

那个播音员在播报周末的天气情况，而我的幻想还在向前突进：我手持手枪，一声枪响，一个人应声倒地。新闻的后续部分按照逻辑就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据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一位柏林的大学生已经做出要杀死 R. 法官的决定——如果从收音机里传来这条紧急插播的新闻，我不会为此而感到诧异。

你不要胡思乱想了！怎么偏偏就是你！忘记它吧！我试图遏制住自己的幻想。这件事连奇怪都算不上，这简直就是可笑，就是愚蠢，根本就不值得为它费脑筋。到此为止！

因为我连把铺路石拿到手里的勇气都没有，更不用说把它扔出去。要我去做凶手、做谋杀犯，这个假设过于大胆，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这是疯狂、失去理智的。但是今天我在想，也许正是因为其荒诞性，这个假设才迸发出了火花并点燃了我一触即发的想象力，与此相关的画面于是接踵而来：

位于维茨雷本大街的柏林最高法院。我靠在对着法院的某幢房子的大门口，我是主角，在等待着那个作为司法者的谋杀犯。不一会儿他就出来了，那是一位没什么特别之处的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他从大门出来，下了几级台阶，朝着他的车的方向走去，而就在此处我很快地通过凹槽和准星瞄准并连发三枪将他击倒在地，然后安静地消失在丽岑湖方向。所有路人都认出我是凶手，但没人阻止我自信而骄傲的脚步：一年轻男子，年龄约二十到二十五岁，身高约一米八0，纤瘦，金发，身着深蓝色风衣和蓝色牛仔裤。——直到警车拉响警笛从帝王大道呼啸而来并宣布我的庄严被捕，电影也就此结束。

很简单的电影短片：一个恶棍，一个小伙子，一次枪击。显然这是一部B级电影，但是我立刻就感受到了它的激励作用：有幸做几分钟的英雄和正义的复仇者。

那时已经太晚了，我无法选择。因为那是在一九六八年，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并将这一切变得更为艰难。

杀害朋友父亲的谋杀犯

回忆在几个小时后再次降临，当时我正躺在卡特琳身边，她刚刚满足地转了个身睡着了。不，她不是法国人，而是一个相当好的摄影师，是从马克特雷特维茨³跑到柏林来的。为了赶时髦，她把自己的名字“卡特琳娜”升格为法语里相应的“卡特琳”，并极其重视末尾那个拖长到

³ Marktredwitz，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

余音萦绕的“i”的音⁴。我和她一起上街、上床，如果我不想自欺欺人的话，我得说我和她的爱情就是没有“爱情”这个字眼也撑得下去的那种。我们在一起讨论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和美学问题，但是关于我作为谋杀犯的事业却一个字也不能透露给她。

我很羡慕卡特琳的睡眠，这羡慕让那些在傍晚已经出现过的声音和幻觉也一起苏醒。我的大脑像处在来回摇摆不定的决定、权衡和历险中那样，就是不肯入睡。我被心中涌动沉浮着的各种感觉包围着，在与自己的对话中遭受着煎熬。有人在愚弄你，我对自己说，这是个圈套。现如今谁还会为一个老纳粹这么激动？让那些喜欢生气的人生气去吧，他们会用疲惫嘶哑的声音对这个判决表示抗议，由他们去吧，这没问题，即使这么做一点儿意义都没有。他们徒劳地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和从前一样受辱和无助，他们是硕果仅存的仍在坚持的人，然后他们回家，直到下次再出来抗议，他们用不着等很久，就会又从哪儿蹦出来一个被宣判无罪的纳粹谋杀犯。

我听着卡特琳均匀的呼吸声，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她的肩膀，嗅着这激起我欲望的身体，并试图使自己平静下来：睡吧，睡吧，有别的事情比痛打或杀死很久以前的敌人更有意思，他不过是不计其数的自由自在到处乱跑的罪犯中的一个。让那些老纳粹接着工作，让那些已经退休的散散步，让他们礼拜天在热气腾腾的烤猪排前磨刀霍霍去吧，这跟我有关系！

这是无法改变的，我跟自己说，又不能把他们全都圈起来。太多了，他们无处不在，在行政部门和法院里，在康采恩和大学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是一个乏味的事实，一种司空见惯的寡廉鲜耻，一套让人心生厌烦的空话，忘了这些吧。这跟你没关系，别把自己扯进去。他们现在拥有着权力或者缅怀曾经拥有的权力，他们在老板椅或软垫沙发上打着盹儿、在养老院的床上等死、和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⁵一样做着大买卖，或者和卡特琳曾是兢兢业业的纳粹市长的父亲那样，现在正经销家具用品的专业商人。为卡特琳父亲那聪慧美丽的女儿而感谢他吧，忘记他，忘记这些人！

⁴ 卡特琳的名字在法语中是 Catherine。

⁵ 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Hermann Josef Abs, 1901—1994），德国银行家。

你越是努力想忘记，实际情况就越是相反。但是那天晚上我还不知道这条简单的规律。我想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努力入睡，试图忘记，但就在我刚要打瞌睡的时候，那关键性的一幕突然闪现在了我的脑海中：我的朋友阿克塞尔坐在食堂的桌子前，我们的旁边放着一份报纸，打开的那页上有个大标题，说的是对这个法官的诉讼的最初审理情况，就是此人在人民法庭上将至少二百三十人宣判了死刑。这一幕的画外音也同时传来，那是阿克塞尔的那句尖刻而轻蔑的话，那句话直到现在，在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才恶毒地让我醒悟过来。他说的是：就是这个人做出了对我父亲的判决，这个人 和弗莱斯勒⁶。

阿克塞尔的父亲是被纳粹杀死的，因为他为反对纳粹而抗争，关于他的神秘故事早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我心里时时出没。在此期间我听说，他的父亲和罗伯特·哈沃曼⁷，还有其他一些人一起成立了一个反抗纳粹的小组，并因此在一九四四年，还是在六月二十号之前，被处死了。

而直到现在，在尼古拉日的深夜里，我才明白：这就是那个人，就是他让人砍了格奥尔格·格罗斯库特的头！我最好的朋友的父亲的头和罗兰德·弗莱斯勒一起！而他现在居然不必为此受到惩罚！

我现在大概可以说，直到这时那个孩子才开始以反抗的姿态出现在我体内——其他进一步的东西留给心理学家分析去吧。黑暗中我睁大了眼睛，清醒地认识到为什么那个法官对我这么纠缠不休，为什么我觉得他像个魔鬼似的坐在我背上，为什么那窃窃私语会追随着我并迫使我采取行动。

现在我听到的不再是那个播音员，而是自己的声音在说：有一个人将要把这个谋杀犯杀死，而那个人将是我！

在那年年底这并不是个什么不合情理的想法，那年马丁·路德·金⁸

⁶ 罗兰德·弗莱斯勒 (Roland Freisler, 1893—1945)，1942年8月被希特勒任命为帝国人民法院院长，上任后被判处死刑的人数骤增。弗莱斯勒鼓吹“国家社会主义刑法”，他给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所做的批示经常是“必须要砍头”、“必须要掉脑袋”。

⁷ 罗伯特·哈沃曼 (Robert Havemann, 1910—1982)，德国化学家、政治理论家。1942年与他人共同成立抵抗主义小组“欧洲联盟”。1943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人民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但被推迟执行。1945年被苏联红军解救出狱。1964年后，因在民主德国持不同政见，被长期软禁，开除出“德国统一社会党”，解除职务，从“德国科学院”中除名，从“反法西斯战士”名单中取消。

⁸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1929—1968)，美国政治家、宗教领袖。1968

和罗伯特·肯尼迪⁹被刺杀，鲁迪·杜什科¹⁰的运气也好不到哪儿去；也是在那年越南和墨西哥发生了大屠杀；还是在那年在巴黎爆发了起义、在布拉格爆发了反抗俄国坦克的斗争。每个月都会发生新的伤害正义感的事情，每个月都会激发愤怒和激动情绪。这些戏剧性事件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证明这样一种愿望的存在：那是对改变、反抗和自由的愿望。权力已经腐败堕落，不管是在莫斯科、华盛顿还是在波恩和巴黎，对那些要求最基本权利的人们的镇压都是一样的冷酷无情。如此简单的世界观，如此复杂的问题：必须自卫，但是如何自卫？

我变得平静了一些并努力说服自己，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它至多算得上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算是对启蒙、民主和正义的一个小小的贡献。就像贝阿特·克拉斯费尔德所做的那件事情那样：她在四周前，就在基民盟那帮一起开会的党代表们面前，掴了联邦总理一记耳光。

我再度审视了此事：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七日发生了著名的耳光事件，我现在说的是十二月六日到七日间的那个夜晚。我宁愿冒被当作模仿者的风险，也不愿被指责为在事实面前表现出了怯懦。

我们来说说这个克拉斯费尔德，这整件事情像是某个遥远年代的童话：她拿着一张记者证进入了基民盟党代表大会的会场，联邦总理正在给人签名，她从他后面靠近，没从前面，这样他就无法躲避，然后就在基辛格¹¹转身的时候奋力扇了他一记耳光并大声喊着：纳粹，纳粹！对她的即快审判程序当天下午就开始了，罪名是人身伤害罪和蓄意诽谤罪，因为把一名前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外交部门主管新闻审查和对外宣传的人称为“纳粹”是被禁止的。她被判处了一年监禁，立即执行。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如何？来自全世界的喝彩声，一位女英雄，人们谈论着她，一个女子，一个不会被人们遗忘的女子，她频频被拍照和采访，她是既有人恨也有人爱的明星。

年4月4日在田纳西州孟菲斯被谋杀。

⁹ 罗伯特·肯尼迪 (Robert Francis Kennedy, 1925—1968)，美国政治家。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弟弟。1968年6月6日在洛杉矶被谋杀。

¹⁰ 鲁迪·杜什科 (Rudi Dutschke, 1940—1979)，联邦德国学生运动领袖，“议会外反对派”运动的理论倡导者。1968年4月11日在街上被一名青年工人枪击后负重伤。1979年枪伤复发，去世。

¹¹ 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 (Kurt Georg Kiesinger, 1904—1988)，1966—1969年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所属党派为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德文缩写为CDU）。

我听着卡特琳轻微的鼾声，轻轻地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臀部，并努力克制着自己越来越强烈的欲望：我想温柔地把这正在熟睡的人儿唤醒，再一次地引诱她并最终彻底忘掉那件蠢事。她睡得如此香甜，我觉得我任何的亲密举动只会让她恼怒。这时突然有个问题吓了我一跳：卡特琳对我已经打定主意要做的事会怎么说？答案是确定无疑的。于是我决定决不开口问她这个问题，连半个字都不要透露给她。

那时我还不怎么相信女人的直觉，和战士以及西部片里的英雄一样，我认为男人要独自面对艰难的抉择，而女人搅进来后，只会用她们的感情让一切变得更复杂。真正让我不安的是这个问题：如果我去坐牢的话，我们之间的爱情还能持续多久？两年，五年，八年？还是半年？

我已经把大半个晚上都浪费在毫无结果的苦思冥想上了，现在我更想设计一下具体细节，比如说用什么样的凶器比较合适。我想到了手枪、毒药、棍子和刀，但是我的想象力像一个门外汉和初学者那样有限，我没有过什么犯罪经验，甚至连侦探小说都不怎么爱看。我在脑子里排演了各种可能性，设想了我作为凶手的各种姿势：我和手枪，我和毒药瓶，我和棍子，我和刀。但是所有这些看起来都没什么说服力，都像是在无声电影和漫画里那样笨拙，我还是以后再想具体方法吧。平息了所有完美的谋杀策划之后，我循着女朋友的呼吸节奏调整着自己的呼吸，很快就进入了温柔的梦乡。

另外我还得感谢阿克塞尔把那个人简称为 R.¹² 的习惯。他说，谁让人砍了我父亲的头，我也至少要从他名字的尊称中砍掉几个字母，即使这样有些可笑。阿克塞尔学的是心理学，并跟我解释了这个理由。

砍头

现在该讲讲阿克塞尔的故事了。我们得回到很多年前，到五十年代甚至是四十年代去，我们得离开柏林，转到黑森州那中等高度的山脉中去，在巴特赫尔斯费尔德和富耳达之间寻找一个叫做维尔达的地方。走公路到那个地方去的话有这么几种可能性：从北边经过雷那，从南边经

¹² “雷泽”这个名字在德语里的全称是 Rehse.

过罗滕凯尔辛，从东边经过下斯道波尔，从西边经过韦茨或者就沿着朗根施瓦茨一直走，到了山谷中间的那座葱头型尖塔教堂后就可以停住了，那里还有很多木框架的房子、谷仓和两座城堡，在它们后面是绵延向上的草地和田地，直到绿茵葱茏的圆形山顶，这些山就这样环绕着村庄。

我所描述的这个小村子在我所要披露的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故事情节上演的地方。我的犯罪动机就在此萌芽。

让我们来听听两个孩子之间的对话，这两个孩子一个是曾在维尔达生活过的城里孩子阿克塞尔，一个是乡下孩子，也就是我。他们大概十二三岁，是很要好的朋友。阿克塞尔像往常一样，在暑假里和他哥哥罗尔夫一起从柏林来到了他们姑妈的农庄。城里孩子和乡下孩子在一个礼拜天下午沿着田间小路穿过村子，当他们觉得和兄弟们还有其他男孩子玩得没劲时，他们经常这么做。那天艳阳高照，微风轻轻地拂过麦田，收获的季节还没有到来。然后那个乡下孩子开始抱怨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除了礼拜天每天都要一丝不苟地检查他对拉丁单词的掌握情况。乡下孩子一直抱怨着，直到城里孩子说：你应该为你还有父亲感到高兴。乡下孩子被吓了一跳，因为他很早以前就知道，朋友的父亲在战争中死掉了，但是好像和其他死去的父亲死得有些不一样。一群麻雀从小路上惊起，它们带起来的风掀起了一阵向前翻滚的麦浪，罍粟花的红不是血红，那种颜色比血好看多了。在长长的沉默之后，城里孩子开始讲关于他的父亲的事情：那位医生，他反对发动战争并让成百上千万人丧命的纳粹。乡下孩子还有一些朋友，这些朋友没有父亲，只有照片上的父亲，父亲们伴随着“阵亡”、“失踪”或是“留在了战争中”这样的字眼消失了，他们的孩子只能看看挂在五斗柜上面的父亲的照片。从前，据乡下孩子所知，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还有过一个元首，这个元首被神秘地另称为“希特勒”或者“阿道夫”，这些名字总是那么简短急促地从人们的嘴里蹦出来，语气或是神秘或是倔拗。好像这一切还跟一个叫做“纳粹”的词联系在一起，那是些晦暗的形象，人们提到他们时总是捂着嘴小声说话。但是这样的一位父亲乡下孩子还从没听说过。因为他反对战争，城里孩子说，就被人杀死了，这些罪犯。在那一刹那间，有两种情

感同时闪进乡下孩子的心里：一是恐惧，一些德国人就这样把一个德国人、一位医生给杀死了，还有就是另一种恐惧，因为朋友尖锐地宣称纳粹分子是罪犯。这是新鲜的，而且清晰得有些尖刻，这好像有点儿走得太远了。乡下孩子的父亲也反对战争。战争是世上最严重和最悲惨的事情，父亲说，为我们拥有和平而感到高兴吧。乡下孩子在城里孩子面前引用了父亲的这句话，并且说自己的父亲并没有因此而被杀死，他甚至还在法国人的战俘营里待过。城里孩子很快就回答说：但是我的父亲在战争中就已经说过这些了，而你的父亲是在战争后才这样说的。

云雀在高高的天上飞着，太阳晒的开始让人觉得有些受不了了，乡下孩子感觉到了自己的脸颊在发热。他本来想用父亲在战俘营待过的事情来吹吹牛的，不管怎么说父亲在那里待过三年呢，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打击，丢了脸。

又是长长的沉默，然后是这个问题：然后呢，他们把他枪毙了？停顿。不。停顿。绞死了？停顿。不。停顿。那到底是什么？停顿。那是在牢里。说说啊。他们砍了他的头，就用一种带斧子的机器。

幸好这时他们已经到了树林的边上，那里有树阴，还有可以坐的树桩子。乡下孩子沉默着，城里孩子沉默着。房子、谷仓和牲口圈静静地躺在山谷中，礼拜天里路上没有拖拉机和牲畜拉的车。猪和牛在安静地吃着饲料，下午的时候连狗啊鸡啊什么的都不叫，也没有钟声。只有一种声音：云雀飞过麦田的声音。砍头，这两个字无声地穿过山谷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然后回音就这样折回来，又慢慢地消逝在乡下孩子的心里。砍头，只有在杀鸡的时候才这么做，用手把鸡翅别住，把鸡放在砧板上，鸡挣扎着，女主人举起斧子，这是女人的活儿，然后把头砍下来，血喷溅出来，头落到了地上，而鸡还在抽搐挣扎着。有一次乡下孩子还看见一只没了头的鸡飞到了天上，它急速地扇动着翅膀飞过了半个院子，然后就像被射中了那样，突然就落了下来。砍头，放血，拔毛，清洗，盐渍，然后放到锅里，这就是鸡的命运。兔子就不会再被砍头了，杀猪的时候人们会把一个销子钉到它的脑子里，而牛会被牲口贩子拉到屠宰场，总之，除了鸡以外其他动物都不会被砍头，为什么人会被砍头

呢？乡下孩子自己琢磨着这两个词“砍”、“头”，他没法再跟朋友讨论了，因为朋友已经说的够多的了，他自己琢磨着这两个词：“砍”、“头”。

这两个好朋友在他们还蹒跚学步、咿呀学语的时候就认识了，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差不多是在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的。阿克塞尔和罗尔夫在战争结束前的倒数第二年被从柏林送到了村里的外祖母家。他们的外祖母，也就是安内莉泽·格罗斯库特的母亲，租住的是牧师的房子，而孩子们的姑姑，格奥尔格·格罗斯库特的姐姐，就住在隔壁。格罗斯库特太太在她的丈夫被处死后也曾来此避难。这两家的房子紧挨着，中间只隔了花园的一个小门。维尔达没有遭到空袭，而且这里还有吃的，后来美国人就来了，这里就再没断过食物。这两个好朋友，手牵着手一起走过还不记事的最初的童年时光，他们永不分离——即使在阿克塞尔在战争结束后第二年变成了柏林的城里孩子之后。

晚饭时乡下孩子试探着问父亲：他们对阿克塞尔的父亲做了什么？他们砍了他的头吗？但是他只说了前半句。他没有勇气大声说出“头”这个字，因为他在说“K”¹³这个音的时候会结巴，这次因为脑海里那可怕的场景会结巴的更厉害。对，那时候很残酷，父亲答道，我想他是被枪毙的，但是他是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孩子想，这个“但是”是什么意思？共产主义者，一个让人恐惧的词，尽管如此孩子还是壮着胆子又问了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答案于是变得更加肯定和清晰：就是和东边那些人一样。那儿没有自由，还想禁止人们信仰上帝。孩子的心里涌出了更多的问题，但是他不敢再问下去了，因为这一切听起来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可怕。

就是哪儿有些不对头。如果格罗斯库特先生向着东边，那格罗斯库特太太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为什么还留在这儿？还有说到“自由”，如果有那么一位女子，她兼具了洒脱、好心肠、乐于助人、慷慨、喜欢旅行等等这些品性，那就是阿克塞尔和罗尔夫的母亲。

直到第二天早上乡下孩子才问城里孩子：你父亲是个共产主义者吗？其实他原本还想问：为什么他们要砍共产主义者的头？但是这个问题也哽在了喉中。朋友回答得很快：谁跟你说的？我的父母。城里孩子

¹³ “头”在德语里是“Kopf”。

盯着乡下孩子看了很久，用一种惩罚背叛者的眼神。你的父母不了解他，他只是想让战争停止，不要再有人被杀死。还有呢，乡下孩子问，他不是向着东边的？当然不是，你这个白痴！城里孩子然后开始放声大笑，他像个城里人那样无情地格格格地笑着，乡下孩子还没见过这种笑法，他觉得很丢脸，于是就逃跑了，跑回了家里。

乡下孩子也知道，战争后东边和西边之间的边境线才把一个国家分开了，但是他觉得自己在此类谈话中很笨拙，处于下风，显得很愚蠢。那两个词“砍”、“头”如跳动的火焰那样纠缠着他，他没办法让它被闷死或者被熄灭。更厉害的是他心里暗藏的怒火，因为他在朋友那儿做错了事情，他出卖了朋友。这件事情对他无情的打击就像他在童年所曾遭受的第一次灾难那样：他又哭又嚎了好几个小时，因为有人把他的朋友从他身边夺走了。阿克塞尔和罗尔夫该回柏林去了，战争已经过去两年了，可是如果说罗尔夫得去上学的话，阿克塞尔为什么不能留在维尔达呢？长流不止的泪水是他唯一用来反抗迫近的失落的武器——直到格罗斯库特太太走过来并送给他一本书作为安慰，那是一本真正的儿童书，不仅仅是一本画册，是一本真正可以在以后读的书，书的名称是《尼尔斯骑鹅历险记》¹⁴。

乡下孩子想把这本书找出来，但是没有找到，然后一直到晚上他都避着他亲爱的朋友。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们就又和好了。城里孩子收回了“白痴”这个词。从此以后他们在关于被砍掉的头和共产主义的未解之谜这些问题上都保持着沉默，乡下孩子在很多年后都不敢打破这种沉默。

现在，我对法庭上的心理学专家们讲述了这一切，您了解了我最初的经历。您现在可以进行对我本人的分析了。请吧，请您从一个四岁孩子的眼泪和一个乡下孩子的想象中得出您的结论吧。

¹⁴ 《尼尔斯骑鹅历险记》是瑞典作家拉格洛夫的童话作品。1903年拉格洛夫受托撰写一部既包含瑞典历史地理、又适合9至13岁孩子阅读的作品。作品完成于1906年。格拉洛夫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